

袁钢明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估测与调控难点分析

内容提要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引起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全社会用电量、铁路运输量等指标来看,经济形势的下滑程度较大程度低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持续下滑的经济对企业经营、政府财政收入、居民收入和就业等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不利于当前政府所提倡的产业结构转型的顺利实施。本文就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分析估测,认为原因并非潜在增长率的下移,而是由于政策失误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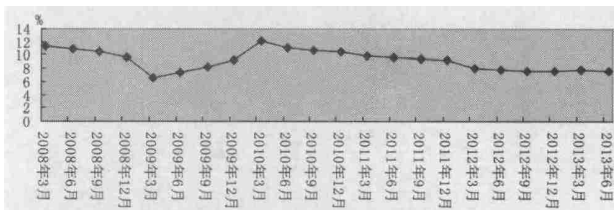
关键词 经济下滑 冲击影响 政策评析

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没有出现很多人预想的回升性变化,而是沿着近年来的下滑轨道继续下滑。对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现象,政策部门和学术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占有压倒性地位的观点认为,中国目前这种变化合乎政策预期,表明了新一轮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近一时期中国经济的这种下行变化是不利的,对社会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构成了挑战。我持后一种观点。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还没有摆脱下滑压力,存在着困难和风险进一步增大的可能。对于中国经济的这一变化动向及其矛盾与风险,需要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这就是本文所要去做的工作。

一、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程度的估测和冲击分析

2013年第二季度中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全面下滑,降低到了近年来的新低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GDP增长速度减缓到了累计7.6%,第二季度同比7.5%,降低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复苏后再下落到来的最低点。GDP增速从2010年第一季度12.1%的复苏高点转为下滑,到现在已经连续下滑13个季度,降低了4.5个百分点,比当初高点位置低三分之一多(图1)。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连续时间长、幅度之大,为多年来甚至是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所未见。

图1 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经济下滑变化



李克强总理2007年任辽宁省委书记时,重视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观测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这种方法被国外研究机构称作为“克强指数”。“克强指数”所重视的用电量和铁路货运量指标,也是国内很多部门和研究者广泛使用的分析指标。本文也基于此角度观测和检验经济增长和运行真实状况的关键指标。

从工业增加值和GDP的相关关系来看,国家统计局公布,2013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下落到9.3%,GDP增加速度已经降至7%以下。而从用电量、铁路货运量、煤炭产量增速大幅

度下落乃至负增长的情况看,GDP实际增速可能比公布数据下落得更低。

(一)中国经济增长与用电量的相关性分析

从用电量方面来看,2013年上半年用电量增速和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大幅度低于正常水平,与经济增长数据差距过大。2013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长5.1%,电力消费弹性系数(用电量增速/GDP增速)0.7,大幅度低于改革开放以来正常经济增长情况下用电量增速及电力消费弹性系数。2000-2012年期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平均增长11.4%,电力弹性系数1.13,除金融危机冲击外的经济运行正常年份电力消费弹性系数都高于1.1。

对于用电量大幅降低而经济增速并未相应降低的数据不匹配问题,多年来统计局解释为结构调整和节电降耗促使用电量较快下降。2013年第一季度再一次强调重工业尤其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等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增速下降幅度大于其它行业。在经济下行期,高耗能行业增速往往最先大幅度下落,带动电力更大幅度下落。

图2 2009-2013年工业增加值增速、用电增速、用电结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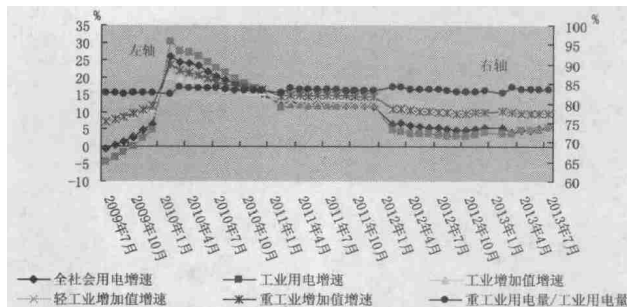


图2表示2009年下半年以来轻重工业增速和全社会用电增速累计季同比变化情况。自2010年2月至2011年12月,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下落,重工业增加值领先大幅度下落,累计季同比增速从23.7%降低到14.3%,下落了9.4个百分点。此期间重工业、轻工业及全部工业增加值从15%以上的高速增长分别下落到14.3%、13.0%和13.9%的中速增长,重工业增加值降幅最大,其用电量占全部工业用电量比重从84.1%降低到83.2%(图中右轴),工业用电增速从30.1%大幅度下落到12%,下落了18个百分点。按统计局的解释,重工业增加值降幅大,用电量比重下降,影响用电量降幅大于工业增加值降幅。工业用电量累计同比增速从高于工业增加值增速9.4个百分点下落到低于工业增加值增速1.9个百分点。这期间2011年2月至2011年12月用电量增速与工业增加值增速相差2个百分点左右,二者大体匹配。

然而,2012年2月至2013年6月经济增速继续下落,轻工业增加值增速降幅扩大,2012年2月重工业用电量比重上升到84.2%,比上年同期升高1.5个百分点。2012年11

月至2013年2月重工业增加值增速略微回升,2013年3月和6月重工业用电量分别为84%和83.4%,比上年同期微升0.1个百分点。按照统计局的结构变化说法,这期间用电量增速不应该下降。而2012年2月以后工业用电增速和全社会用电增速大幅度下落到7%以下,2013年3月全社会用电和工业用电增速分别下落到4.3%和3.7%,分别比GDP增速和工业增加值增速低3.5和5.8个百分点。工业用电增速与工业增加值的离差最大时超过7个百分点。统计局结构调整导致用电量增速下滑的说法对以上现象难以解释。

从上述所分析的2012年年初以来变化情况看,这段时间重工业用电比重略微上升,用电量大幅度的下降,不是结构调整和节电降耗的效应,而是经济下滑的冲击,生产开工率下降、产出增速低落致使用电量大幅减少。按照2011年用电增速和经济增速大体匹配的关系估测,工业增加值和GDP实际增速下滑程度比统计数据严重,2012年分别大约下滑到5%和4.5%左右,2013年第一季度大约下滑到4.5%和3.5%左右,上半年大约下滑到6%和4%左右。

再看电力消费结构的长期变化,是否发生了高耗电部门耗电比重下降的结构变化。

图3 2000年和2011年轻重工业耗电结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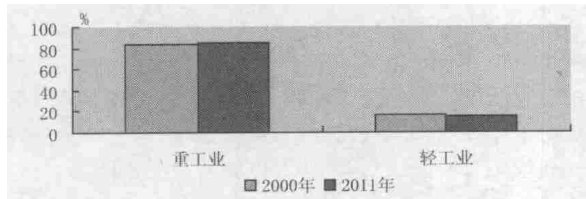


图3表示2000年和2011年工业中重工业、轻工业用电结构比较。从2000-2011年的12年期间,高耗电的重工业用电占工业用电比重没有下降,而是从82.9%上升到84.8%。

图4 2000-2011年高耗电行业耗电比重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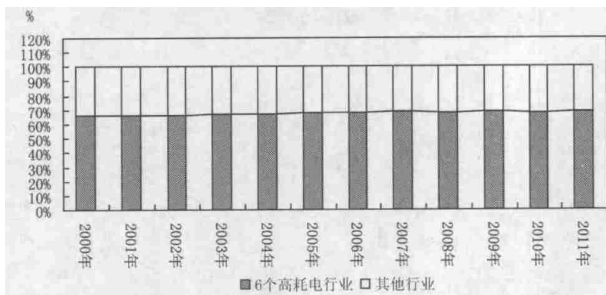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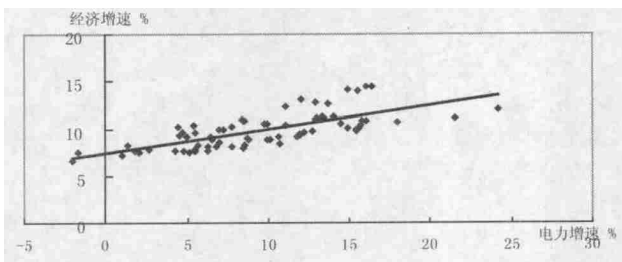


图4表示2000-2011年工业细分行业用电结构变化情况。此期间全部工业行业中耗电比重排在前六位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化工原料等六个重工业行业合计耗电比重从66.0%升高到68.8%,统计数据显示,高耗电行业耗电比重平稳上升。

图5 1995-2013年电力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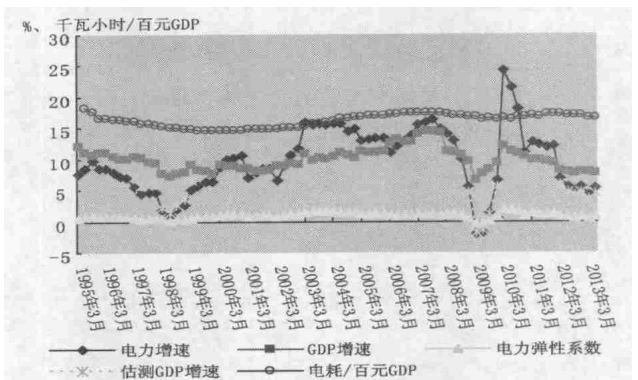


由于用电数据不完整,发电和用电具有同时性和一致性特点,差异很小。因此2009年7月以前缺少的用电数据用发电数据替代。

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用电量增速和经济增速关系紧密。图5是1995-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电力增长累计季同比增速相关关系散点图。图中GDP增速和电力增速呈直线线性分布,相关系数为0.719。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数据包含了经济急剧下滑时统计数据高报经济增速造成的数据离差过大干扰。中国经济实际运行中的用电量增速和经济增速相关性比含有人为干扰的统计数据更为紧密。

此外,2000年以来我国电力弹性系数稳定保持在1以上,总体上电力消费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图6表示1995-2013年各季度中国经济电力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变化情况。1995-2013年上半年电力弹性系数(电力增速/GDP增速)平均0.99,2000年以前低于1,2000年以后稳定升高到1以上,平均1.2,电力消费和生产总体上呈稳定增加趋势。如果按GDP当年价格计算,单位产值电力消耗呈下降趋势。图6中单位产值电力消耗(千瓦时/百元GDP)按1995年GDP不变价格计算,剔除了价格上涨因素,所呈现出的稳定上升趋势更为准确。单位产值电力消耗从2000年的14.7千瓦时/百元GDP增加到2012年的17千瓦时/百元GDP。

图6 1995-2013年电力与经济增长关系变化



2000年以来,无论从用电总量、用电结构,还是用电效率来看,都没有出现用电减少的变化;无论从十几年的长期变化,还是一、两年内的短期变化,特别是当前转变性短期变化来看,都没有出现用电减少的结构变化。据此可以确定,中国经济当前及以往几次下滑期间用电增速大幅度低于经济增速数据的不匹配问题的原因,不在于用电结构调整和节电效率提高致使用电量减少,而是经济增速数据高报。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估测和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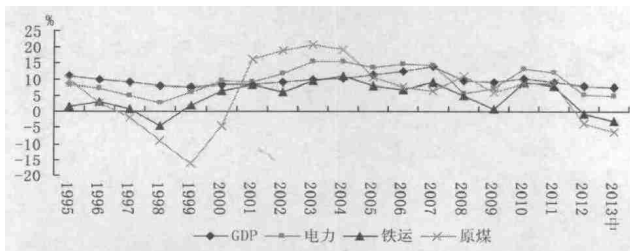
中国经济的电力弹性系数十几年来基本稳定在1以上。长期统计数据所反映的电力增速略快于经济增速的紧密稳定关系,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事实是一致的。在经济下滑的短期波动期间,电力增速和经济增速出现过程度的离差,不是电力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事实发生了松散性或背离性变化,而是经济下滑期间的统计数据偏离了事实。由于电力数据的客观性和准确度高,电力和经济增长关系具有坚实的事实基础。在经济下滑期间,电力和经济增长数据不匹配、经济增长真实状况难以判断的情况下,用电力生产和使用情况估测和检验经济增长是可靠的。

如图6所示,1995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三次大的下落,分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的1998年前后、美国次贷危机冲击后的2008年和2009年、欧债危机冲击后的2012年和2013年,这三次经济下滑都出现了电力和经济增速差距过大

的数据不匹配、统计数据高报经济增速的问题。当前与2000-2008年期间相比,全社会单位产值耗电和高耗电行业比重和实际电力弹性系数略高。如果将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回升的数据代入进来计算,更靠近当前时期,电力弹性系数更高一些,从而据此计算估测出的经济增速就更低一些。

“克强指数”重视的铁路货运量和用电量指标变动性态相近,可用于进行佐证性观察和分析。2013年煤炭产量增速急剧下降,与电力和铁路货运增速下降变化紧密相关。这一新的变化情况应当引起重视。目前阶段的中国经济,煤炭占能源总量80%,煤炭发电量占发电总量70%多,煤炭铁路运量占铁路货运总量90%以上。当前发电用煤需求减少,导致煤炭滞销积压,产量和运量锐减。从图7可以看出2012-2013年铁路货运量和煤炭年度增速从接近10%下降为负数,2013年上半年铁路货运量和煤炭累计同比增速进一步下降到-2.8%和6.3%,反映出电力及经济增速下滑的严重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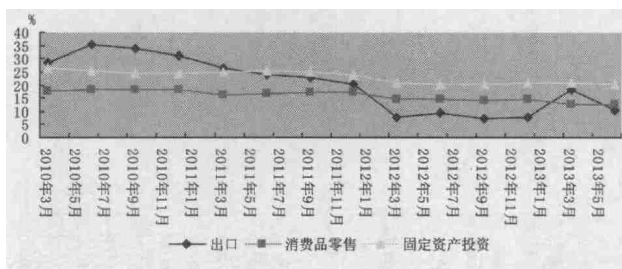
图7 1995-2013年GDP、电力、铁路货运、煤炭产量增速变化



1995年以来,电力、铁路货运、煤炭产量增速与GDP增速同起同落,相互之间相关度很高。与GDP增速相比,铁路货运量增速略低,煤炭增速波动幅度较大。当前铁路货运和煤炭产量增速大幅度下降,为上述电力和GDP增速实际下滑程度超过统计数据的估测分析提供了相关数据支持。

宏观经济主要指标出现下滑加重的现象。图8表示2012年年初以来,出口、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三大需求全面下落的变化情况。采用具有完整季度序列的出口、社会消费品零售、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替代数据,推算估计出出口、消费、投资三大需求季度序列数据。从图8可见,三大需求累计同比增速从2011年底20%上下,分别下落到2013年上半年的10.4%、12.8%、20.1%。其中,出口降幅最大,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最小。固定资产投资降幅小是因为2012年出台了阻止经济下滑的投资扩张措施,减缓了正在趋于加重的投资下滑态势。这并不表明投资未出现下滑,而是重走投资扩张刺激的老路。

图8 三大需求增速变化



二、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冲击影响

中国经济增速连续三年下滑,对企业、政府、居民生活等多方面造成较大冲击影响。

(一)经济增速下滑对企业经营的冲击影响

经济增速下滑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造成了冲击,企业经

营首当其冲。市场需求急剧减弱,工业出厂产品价格(PPI)自2012年1月起大幅度下降,2012年下半年后同比降幅扩大到近-2%,进入2013年后,降幅进一步扩大到超过-2.5%,工业品中下滑波动大的煤炭、钢铁出厂产品价格下降到-14%和-10%(图9)。全部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从2011年的25%以上下降到2012-2013年的10%左右(图10)。钢铁、煤炭企业近乎全行业亏损。

图9 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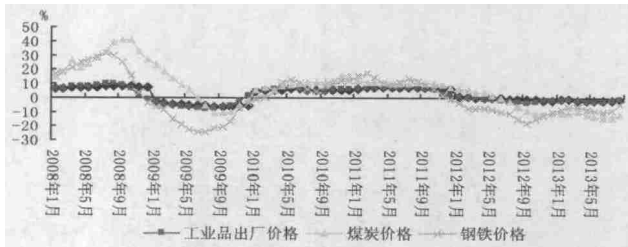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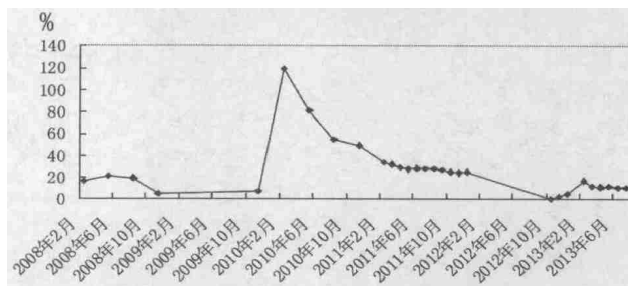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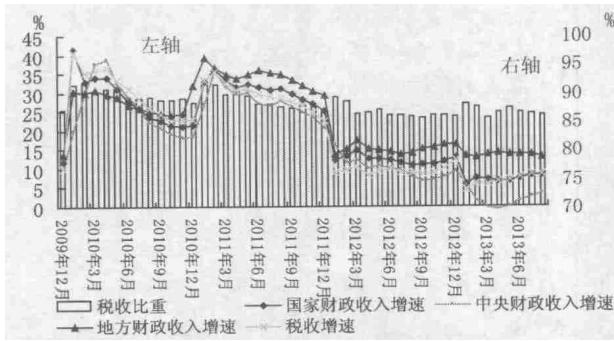
图10 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变化



(二)经济增速下滑对财政收入的冲击影响

政府财政状况受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企业收益减少等影响,面临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的局面。图11表示财政收入及其结构变化情况。财政总收入增速从2011年25%以上的高速增长急剧降低到2012年接近10%,2013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到10%以下。经济下滑造成税收增速连连下落,使掌控增值税等主体税种大税源的中央财政受到较大影响。2012年税收增速从上年20%以上陡然降落到10%以下。进入2013年,税收增速降低到5%左右,中央财政收入降得更低,4月份份降低到-0.8%。地方财政收入增速高于中央财政收入,2013年上半年保持在13%左右,但这并不表明地方财政状况比中央财政状况好。中央与地方分税制下的地方财政缺乏稳定的税收来源,却要承担超出财政支出能力的地方事务,很多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地方政府利用政府融资平台,以土地抵押等方式大规模融资,很多地方政府负债过多,偿债能力下降。2013年2月以来,房地产交易热潮喷涌,房价地价大幅上涨,地方政府乘势高价出售土地,卖地收入和房地产相关税费收入大量增加。2013年上半年,地方出让土地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46.3%,占地方财政收入总量的46.1%。归属地方财政收入的房地产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分别同比增长45%、39.8%、28.1%。卖地收入和房地产相关税收大幅度增长,支撑了地方财政。地方政府以此平衡当地财政收支,提升偿债能力。经济下滑越重,地方财政偿债能力越差,地方政府就越是依靠推高房地产价格出卖土地等非税收方式增加财政收入。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比重不断降低,2011年下半年,税收比重长期以来稳居90%以上的局面被打破,随着经济下滑和地方财政困难加重,税收比重一路下降,2013年3月下降到8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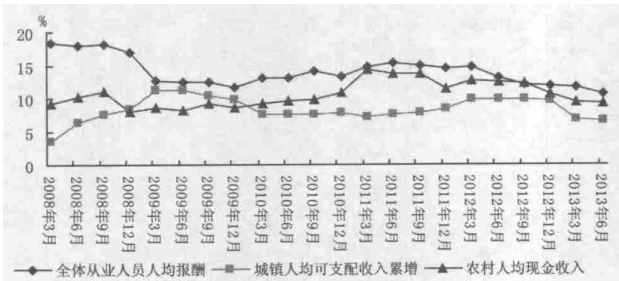
图 11 财政收入及其结构变化



(三)经济增速下滑对居民收入和就业的影响

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受经济下滑影响而减缓。如图 12 所示,从业人均报酬增速在经济明显下滑一个季度后即 2012 年第二季度起下滑,从增速 14.5%以上下落到当年底 12% 以下,2013 年上半年进一步下落到 10.7%。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明显下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速从 2012 年第三季度的 12.3%降低到当年底的 10.7%和 2013 年上半年的 9.2%。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从 2012 年底的 9.6%降低到 2013 年上半年的 6.5%,从高于同期统计数据经济增速下降到低于经济增速。城市居民收入主要包括工作报酬和投资收益,受企业经营状况和股市价格下跌影响而增速下降。农村居民收入主要包括家庭经营收入和打工收入,受农产品需求和劳动力市场需求减弱影响而增速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下降,使居民消费需求普遍减弱,经济下滑压力进一步加重,并深刻影响收入分配结构,使国民收入中劳动者报酬及初次分配比重提高的政策目标难以实现,收入分配不合理矛盾加剧。

图 12 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变化



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经济下滑变动没有对劳动者就业及收入造成很大冲击,没有出现 2008 年金融危机冲击时数千万农民工失业返乡潮,由此可以判断此次经济下滑及其冲击并不严重。然而,实际上此次经济下滑波动变化中企业停产停工、开工不足,在职劳动者工作天数和工时减少,造成职工报酬下降。据笔者调查,金融危机后各级政府部门为防止和减弱经济下滑造成的失业冲击,采取多种行政措施,要求企业并辅之以奖惩办法,企业停产不停工,停工停薪不解雇,职工失业不出厂,大量劳动者工作时间及收入减少,以前的公开失业变为企业内软性失业。这种行政措施对于缓和劳动者失业冲击及社会动荡具有一定效果,但大批劳动者工作时间极少、报酬急剧下降等就业问题没有解决。

(四)经济增速下滑对结构调整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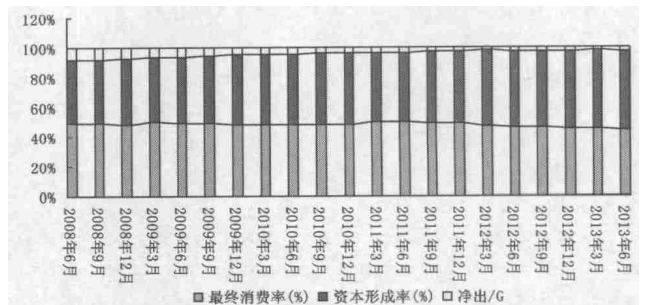
新一届政府高度重视结构调整,明确提出总体经济结构从目前内需不足、过度依赖出口向扩大内需的方向调整转变;在内需结构上从消费不足、投资依赖过重向扩大消费的方向

调整转变,在产业结构上朝着符合上述结构调整方向、发挥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增长潜力的方向调整发展。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状况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形成的,结构调整无法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进行,经济增速下调有利于推进结构调整。但是,自经济下滑以来,结构调整困难重重,难以如愿推进。

图 13 表示 2008 年金融危机冲击以来中国 GDP 总量中消费、投资、净出口比重季度变化情况。从图 13 可见,从 2012 年初经济明显下滑开始到 2013 年上半年,投资率(图中资本形成率)从 48.3%升高到 50.8%,消费率从 49.1%降低到 43.5%,净出口率从 2.6%略升至 3.0%。金融危机后的投资扩张刺激措施在一年时间里将投资率从 43.8%推高到 47.2%,这样高的投资率对经济运行造成巨大压力。今后一个时期投资率应该逐渐调整降低到正常水平,至少应当调整恢复到金融危机前 40%左右的水平。但是,经济下滑压力使结构调整难以走上正轨。投资率没有下降,而是继续上升。上届政府为推动经济快速复苏,推出投资扩张措施,将投资率推到 51%。新一届政府工作起步以后,2013 年上半年投资率略微下落。但是,在经济下滑压力下新一轮投资扩张开始启动,投资率可能还将上升。相反,消费需求没有实现有效的提升,消费增速明显减缓,消费率可能会被上升更快的投资率压得更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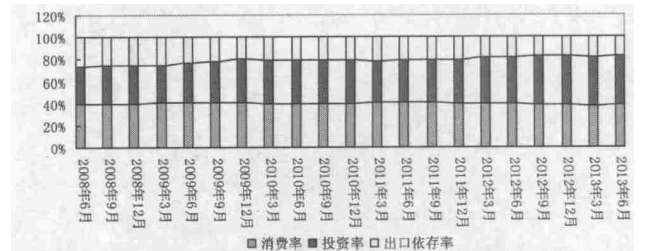
内需与出口的结构调整陷入矛盾困境。支出法的净出口指标是出口额减去进口额的差值。净出口率数值过低,无法反映出口总额及其在 GDP 中占比的完整变化。为更好地观察内需与出口的结构变化,可采用消费、投资、出口各自占 GDP 比重即依存率指标进行分析。图 14 和图 13 一样,采用替代数据推算估计三大需求的季度累计同比变化。

图 13 消费、投资、净出口结构变化



从图 14 可见,金融危机前的 2008 年上半年,消费率、投资率、出口依存率分别为 39.4%、34.2%、26.5%,当前 2013 年上半年分别变化为 37.9%、44.2%、16.7%,消费率降低 1.5 个百分点,投资率升高 10 个百分点,出口率降低 10 个百分点。然而,这期间出口依存率的降低,并不是降低出口依赖、扩大内需的结构调整效果,而是出口增速下滑冲击的结果。

图 14 消费、投资、出口结构变化



出口增速自 2012 年第一季度起急剧下滑,从去年的 20%

以上滑落到 2012 年底的 7.9%。对整体经济造成很大冲击(图 8)。2013 年新一届政府阻止经济下滑的首要措施是推出扩大出口措施,一些地方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出口指标,虚假出口,假报货单,第一季度出口增速虚假升高至 18.4%。大量增加的虚假出口与贸易对象地区和国家的进口数据不一致,资金流与货物流不匹配。第二季度出口真实度提高,出口增速回落到 10.4%。中国出口依存率过高,外部经济衰退致使出口增速下滑,对整体经济影响很大。

从房地产与制造业实业的关系来看,恶化程度就更加明显。从房地产高速增长、房地产投资与房地产销售值增长速度及其在总量中所占比重过高的问题均比过去更加严重。它所带来的实体经济降低、虚拟投机因素增高、结构恶化状况不容置疑。在经济下滑过程中,没有出现合理性的结构调整,或者以某种短暂的调整痛苦,换来增长回升的现象。因此,最近这一段时间不仅增长下滑,而且结构不合理情况加重,暴露出的矛盾增多。

三、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冲击的认识误区

2008 年金融危机冲击过后,中国经济增速很快回升到 12%。随后,从 2010 年第二季度起连续三年下落,一年下落一个台阶,从 10%以上下落到 10%以下、9%以下、8%以下。很多人只看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不看经济下滑冲击的实际情况,不认为这是经济下滑的不利变化。在此过程中,有关经济减速合理性的各种解释不断出现,比如说减速是受基数升高影响、符合潜在增长率下移变化趋势、与政府主动调控的政策预期相符合等等。但是,这些说法的正确性需要讨论。

(一)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冲击暴露的认识误区

1. 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受基数升高影响所致。中国经济经过 30 多年平均 10%左右的高速增长,增长基数不断升高,延续高速增长的困难越来越大。基数升高以后,同等幅度的增速现在与以前相比产生更大规模的增量,同时要素投入、资源配置、技术支持、生态环境等各方面受到的制约增大,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迟早会降低下来。那么,当前中国经济是不是基数高到增速不得不大幅度减缓的程度?

很多人以日本、韩国为例。日本、韩国战后分别实现 10 年和 17 年以上年均 10%左右高速增长后,日本经济增速突然大幅度下降为负增长且是极低增长;韩国经济进入年均增速略高于 8%延续 18 年的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目前减速变化似乎与日本、韩国当时情况相似。其实,日本经济急剧减速的重要原因是政府政策失误。当前中国与日本相比,不应把日本当年政策失误导致的经济急剧下降当作标尺比对,以为中国当前经济增速由高转缓属正常变化。当前中国和韩国相比,应该警惕增速减缓程度超过当年韩国而陷入过低增长。

中国地区差距很大,2011 年人均 GDP 东部地区 10000 美元左右,中西部地区 4000 美元左右,西部多数省区 4000 美元以下。基数升高影响经济增速减缓现象,仅出现在京、沪、津等东部少数发达城市,中西部等大部分地区近些年经济增长刚刚开始加速,增速赶上和略超东部发达地区,发展差距还很大,低基数高速增长的空间很大。基数论说法多以东部少数发达城市增速减缓为依据,以此判断中国经济整体进入增速减缓阶段的说法不足为据。

2. 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受潜在增长率下移影响所致。在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减缓的观点中,看起来最具理论依据和代

表性的观点,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正在下移。一些学者提出,2013 年中国人均国际元预计接近 10000 元,按照国际规律,此阶段很可能发生潜在增长率下落一个台阶的变化,模仿技术等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完毕,满足居民基本消费需求的大规模重工业化 and 城市化基本结束,这种现象在东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2013-2017 年之间整体经济增长将下落到 7%左右为常态阶段。这一观点把当前中国经济大幅度下滑解释为合乎规律变化的论点及潜在增长率下移的推断,得不到中国经济当前阶段增长事实的支持。

目前中国经济所处的阶段,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正在升级,规模巨大,由此拉动的制造业、建筑业、基础设施建设、重工业化及城市化正在进入升级发展新阶段,大规模重工业化 and 城市化远未结束,正处高峰期。对潜在增长率有多种角度的理解和估测。较为普遍的概念是指一国可用资源数量及其配置利用支持经济可能实现的增长率。一定数量的可投入资源,主要是资本、劳动力、技术的数量及其配置计算潜在增长率。这是从供给角度理解和计算的。改革开放以来,在很长时期内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从这一角度展开研究和讨论的。在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受到资本、技术等物质要素供给不足的制约,而且当前潜在增长率状况与过去相比大为改善,甚至是根本性的转变。在很多情况下,资金资本表现为从短缺变为剩余,资本账户从逆差变为顺差,相对应的物质资本及其所包含的技术要素供给也变得充裕,甚至在某种市场条件下表现为过剩,以致于出现了很多资本难以找到投资机会的现象。现在中国以资本和技术资源供给支持和推动产能增长扩张的能力远远超过过去。很多研究者认为,中国劳动力供给发生了一种变化。中国劳动力已经由剩余变为短缺,对潜在增长率造成了影响,东部发达地区出现了企业招工难、劳动成本高的“民工荒”现象。但是,从发生“民工荒”地区的实际情况看,这些地区的招工难问题,不完全是因为劳动力数量供给不足,很多情况下是劳动工资水平提高,企业愿意接受的一定工资水平劳动力供给减少,局部地区企业对劳动工资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不适应,调整不到位。劳动工资水平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但更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有关,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及资源禀赋变化过程中的摩擦和调整,不是中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由过剩变为短缺的根本性逆转,而是素质提高的劳动力供给基础更为稳定、坚实。

改革开放前期和中期阶段资本、技术及高素质劳动力供给方面对潜在增长率形成制约,这种制约随着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近年来,推行节能减排、环境保护,能源、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取得了新的进展。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能源消费增速超过能源生产增速,能源可供量与能源消费量的平衡差额不断扩大,能源供需缺口从 2565 万吨标准煤扩大到 14290 万吨标准煤。2004 年能源综合平衡差额由逆转正,经过几年波动,2010 年能源综合平衡差额正数扩大到 14748 万吨标准煤。这一期间,经济增速加快,能源原材料产业加速更快,能源原材料不像以前那样对经济增长形成瓶颈制约,而是成为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有力基础。经济高速增长和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相互支持,共同推进。很多研究者使用生产函数等数学模型计算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多数计算到 2007 年为止的潜在增长率为 9%-10%之间,和已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大致相当。没有证据表

明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了资源要素供给制约加重、潜在增长率下移的趋势性变化。

从需求角度观察,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存在着潜在增长率被需求不足制约的问题。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增长相对较慢,使很多资源要素投入所形成支持的增长潜能不能释放,一些产业和市场出现了需求不足情况下的产能过剩现象。很多人认为,中国消费市场上家电热、电脑热、家庭汽车热等大规模消费热潮拉动工业化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基本消费需求饱和、储蓄倾向提高,出现了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受此影响,潜在增长率转为下降。

实际上,中国消费需求强弱变化与居民收入增长、就业、收入分配状况变化及政策效应有关。如上文分析,经济下滑以来,居民就业和收入增长受到冲击,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问题加剧。目前中国还存在着较大比重的中低收入人群,存在着提高居民收入、调整收入分配和经济结构的空间。发展方式及政策方向上对重投资轻消费、居民收入比重过低的不合理结构进行调整,推进农民成为新市民的新型城镇化。未来10年3亿多农民进城,收入和消费需求从目前只有市民1/3的低水平提高到与市民相同的水平,数亿中低收入居民实现基本消费需求大规模填空式增长,广大居民进入旅游消费、文化教育消费、高品质商品服务消费、信息消费浪潮的新型消费时代,消费需求的扩大空间很大,支持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增长还有10年以上的时间。

(二)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冲击中的政策选择

很多人认为,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率连年下落,从10%以上下落到7.5%,表明潜在增长率发生了明显下移变化。上文分析论证了经济增长率下落比统计数据更严重,这种下落不是和政策无关的潜在增长率趋势性下移所引起,而是和政策失误有关的波动下滑造成,可以通过政策的调整改进得到改变和扭转。

1. 增长目标的选择。很多人认为,当前经济增速减缓到7.5%左右,是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正好符合政府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这种说法是以政府提出的增长目标为标准。而对于政府提出的这一增速下调目标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有的说8%左右的增长目标提出多年来没有真正照此实现过,是体现中央政府调控意向的指导性指标;有的说7%、8%的增长从世界范围来看是高速增长,对中国来说是速度不高不低、有实在意义的合理目标;有的说政府提出的7.5%的目标,不是力争实现的目标,而是经济下滑不能突破的最低底线。

多年来,中央政府提出的8%增长目标一直低于实际实现的10%左右的增长速度。每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对超出8%计划目标的实际高速增长予以高度肯定。显然,超出计划目标水平的实际高速增长,更切实地体现出政府调控的真实目标。从中国经济持续10%左右高速增长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政府宣布的增长目标是什么,政府实施的宏观调控实际上是按10%左右高速增长状态进行的。国内外各个方面无不认为这种持续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的成功增长。但是,这种高速增长中也存在一些不合理问题,如经济过热、粗放扩张、资源消耗过多等。很多人认为,这些问题产生于高速增长,只有将经济增速降低下来,这些问题才可得到解决。因此,政府将经济增长目标从10%下调到7%-8%是合理的。

在中国经济现实中,很多地方、部门、企业单纯追求GDP增长和数量扩张,忽视效率提高和环境保护。很多人认为,地方扩张冲动总是在宏观调控部门宣布的目标水平上再加码升

高,推动整体经济趋于过热过快增长。因此,宏观调控部门应当宣布增速较低的目标,对地方扩张冲动造成的过高增长倾向产生制衡作用,最终实现宏观调控部门所预期的不过高、不过低的适度增长。这种看法把政府提出的增长目标视为中央调控应对地方扩张的一种博弈性手段,而不是中央政府确定的真实增长目标。

从实际情况来看,在2004-2007年经济增速高于10%时期,中央政府提出的8%增长目标,低于实际实现的高速增长,起到制衡地方过度扩张的调控作用。但是,把调控目标作为博弈手段来使用存在问题,如果调控部门滥用博弈手段,虚虚实实,就会产生调控的扭曲和误导,造成政策失信和失效。如果经济研究者也像有关行政部门那样,对政府提出的增长目标作避实就虚的理解和解释,重视博弈手段而忽略其合理真实含义,就会造成对经济事实和调控目标的误读和歪曲。

“经济增长8%目标”最早是在199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货币过度紧缩等不适当政策影响,使得中国经济急剧下滑。1997年经济增速从上半年10%以上急剧下滑到下半年连续两个季度10%以下。1998年统计数据公布的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到7.2%。本文图6计算估测的当时经济增速实际下滑到了1.3%,当时企业大面积开工不足、很多发电机组停机、工人大批失业下岗。在当时经济增速严重下滑情况下,政府提出实现8%的增长目标难度很大。统计数据公布1998年年底最终实现了增长7.8%,本文估测为3.5%,到1999年第三季度统计数据公布的经济增速回升到和本文估测一致的8.1%。

从经济实际运行状态看,在经济下滑困难情况下提出的8%增长目标和不久后回升达到的8%左右增长,并不是增长潜力得到充分发挥、结构合理、关系协调的良好增长状态。此后“十五”时期和“十一五”时期注重以人为本的协调发展,中国经济实现了略高于10%的经济增长,居民就业和收入增加,企业收益上升。实践证明,在经济运行正常、经济政策和调控合理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可实现10%左右的良好增长。

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从8%下调到7.5%。这一增速下调的增长目标是在经济连续下滑情况下提出的。经济增速从金融危机后2010年第一季度的12.1%复苏高峰上连续向下滑落,到2011年底下滑到10%以下的第一台阶9.3%。2012年第一季度经济下滑压力急剧增大,统计数据公布的经济增速下落到9%以下的第二台阶8.1%,实际下滑幅度更大。根据上文图6计算估测,当时实际增速下滑到了5.8%。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低于当时统计数据的7.5%较低增长目标,和2005年提出8%较低增长目标以希望经济增速由快转缓的情况完全不同。和1998年情况相似,经济大幅度下落真实情况被增速高报的数据所遮蔽。政府提出低于统计数据的7.5%增长目标,并非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政府希望经济增速进一步减缓。2012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多,当年第二季度统计数据公布的经济增速下落到8%以下的第三台阶7.8%,本文估测的经济实际增速下落到4.7%。2012年前三季度统计数据公布的经济增速累计同比降低到7.6%,有的媒体把这样的增速报道为超出7.5%的政府预期,这样的说法令人啼笑皆非。

很多人认为,政府提出的7.5%可能是政府所能容忍的经济下滑底线。这是符合实际的情况。从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过几次8%及更低增长的实际情况看,居民、企业、政府收入增速全面下降,经济运行陷入困境。这绝不是政府调控迫

求、预期的最适合的状态,而是不能再向下滑落的底线。2013年经济下滑局面持续加重,新一届政府正式宣布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底线是7.5%。混乱不清的猜测和争论终于有了结论,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低于7.5%的经济增长。但是,为什么从世界范围来看7.5%是高速增长,而在中国却是难以忍受的底线?本文对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到8%以下的真实增速所做的估测,可对此做出解释。2013年第一季度和上半年统计数据公布的经济增速是7.7%和7.6%。本文估测的经济实际增速是3.6%和4.4%,和这一段时间经济下滑冲击的实际情况基本吻合。在统计数据公布的经济增速从10%以上减缓到7.5%时,中国经济增速实际上已经下落到了4%左右。从世界范围看,这样的下落幅度很大,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运行所不能承受的。

2. 经济增速下滑中出现政策失误。2010年初,中国经济从金融危机后强劲回升转为增速减缓,到2010年底经济增速减缓到10.4%。这一年经济增速由高减缓的变化,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刺激措施退出后经济调整所引起,经济增速减缓和财政货币政策由松转紧的调整变化同步发生。经济增速从12.1%回落到10.4%。单就这一年来看,这样的增速减缓算不上经济下滑。但是,紧接着2011年经济增速继续向下落到10%以下,随后一直不停地向下,落到8%以下。这样一个由高到低的变化过程一步步演变成了持续三年之久的深度下滑。在此过程中,世界经济没有发生新的金融危机,没有出现新的大规模国际经济动荡。这期间,中国经济由刺激措施退出的减速调整演变为不断加剧的失速下滑,与国内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不当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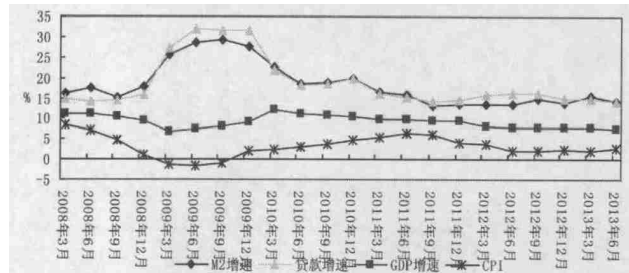
3. 投资刺激措施急进急退。2008年底,对付金融危机冲击的各种刺激措施紧急出台。财政主导的总额4万亿投资大规模展开。大规模刺激措施主要由中央财政主导,中央政府确定投资建设的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大型项目。投资上马速度快,集中度高,下落也很快。这种短时间高度集中、急升急落的投资实施方式一开始就存在不平衡、不匀速、不可持续问题。投资尖峰升高仅一个月便急转直下,2011年初财政投资从同比增速50%以上的高台陡然下跌到最低至-4%的低谷,靠大规模投资迅猛推升的经济增速随投资骤然收缩而下滑。如此急骤上马的大规模投资不可能有相应规模的后续资金跟进。缺乏市场资源配置活力,地方财政、地方债、政策性贷款等配套资金迅速扩张,缺乏责任和风险约束,留下隐患。如图15所示,2012年为对付不断加剧的经济下滑,政府再次推出投资扩张措施,财政投资增速上升到30%,刺激效果微弱,无力阻止经济下滑,反而烂尾工程增多,加重下滑压力。



4. 货币政策过松过紧。2008年底,在大规模投资刺激措施推出的同时,货币政策从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严厉紧缩紧急转变为大力放松。从图16可见,广义货币M2和贷款增速从

2008年9月份的15%左右大幅度升高到2009年9月份最高点30%左右,显现出支持大规模投资、推升经济快速回升的效果。如此猛烈的货币贷款扩大必然造成随后不久的快速紧缩。2010年3月至6月货币贷款迅速收紧,M2和贷款增速从30%左右急速下降到18%。经济增速立即由升转降,由此开始了一降不止的持续下滑。

图16 货币贷款增速、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变化



2010年经济增速下落到10.4%,而调控部门承担的主要压力是前期货币放松造成的货币量过多,通胀和金融风险升高。2011年央行提出恢复货币常态运行,货币政策从大规模增加货币转向大力度紧缩货币,力使货币量尽快恢复到刺激措施前水平。2011年初确定M2增速恢复到货币放松前的16%水平。货币增速从上年底的近20%下降到第一季度的16%。经济增速从10%以上降低到10%以下。这时物价加快上涨,形成经济增速下滑、通货膨胀上升的滞胀局面。2011上半年,经济增速下落到9.6%,消费物价指数上升到6.4%,面对这种矛盾局面,调控部门高调宣布把控制通货膨胀放在首位,毫不犹豫地朝着加大货币紧缩力度的方向推进。调控部门压倒一切的目标实际上是大力压缩货币增量,以使货币量对GDP的倍数即M2/GDP比率尽快降低下来。这是因为货币过度放松使M2/GDP比率从1.5迅速升高到1.8,形成了对货币当局来说的超出一切的巨大压力,经济下滑、通货膨胀等等压力都不能与之相比。

2011年下半年通货膨胀由升转落,物价上涨压力已经消除,经济增速下落幅度加大,而央行继续加大紧缩货币的力度,货币增速下降到13%,并在年初提出将货币增速恢复到16%常态增速的计划,在实施中变成了矫枉过正的非常紧缩。货币急速紧缩造成很多企业资金链断裂,停工停产。2012年货币政策进一步紧缩,将货币增速下调到14%,将经济增长目标下调为7.5%。2012年经济增速断崖式下落到8%及7%台阶。央行没有考虑货币过度紧缩对正在下滑的经济所施加的压力,而是反复强调通货膨胀上涨趋势很强,地方扩张冲动和经济过热压力很大。货币紧缩力度持续加大,货币增速降低到14%以下,使经济增长率下落到统计数据公布的7.5%底线附近,实际增速更低的低谷,通货膨胀率下落到2%左右。2013年货币增速目标进一步下调到13%,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很大的下行压力。

过多的货币存量压力,使宏观调控部门及货币政策部门顾不上货币政策紧缩所造成的经济下滑。投资扩张刺激措施急进急退,货币政策过松过紧,造成经济增长大起大落。应对金融危机的财政货币扩张刺激措施过度,留下了隐患。因此,退出调整应该平缓温进行,而不是强硬推进。中国过松货币政策退出调整路程还很长,困难很大,需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方式协调推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